

“理想国之路” —— 论方天主编《蕉风》时期的寓言与童话书写寄寓

“The Road to Ideal Nation ”—— Discussion on Fairy Tales and Fables published in *Jiao Feng* whose Chief Editor was Fang Tian

章丽君*

(CHIANG Lee Kwun)

摘要

二战结束后，紧接着掀开冷战，大陆随即陷入国共内战的泥沼中，催生了第三势力文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时期，非左翼文人圈中出现了追随蒋政府的文人，第三势力文人，以及自由派文人。追随蒋政府的文人退守台湾，而第三势力文人，以及自由派文人涌入香港。他们创办出版社，而友联出版社是其中一家。1953年1月，友联出版社与亚洲基金会接上关系，并于1955年底在新加坡创办《蕉风》杂志，而亚洲基金会背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因此友联出版社被视为带有“美元文化”背景的右派机构。变节中共创党元老张国焘之子——方天也是香港友联南来作者之一。在他任《蕉风》杂志主编期间，于该刊登载了不少的寓言与童话。结合当时星马的社会与政治氛围来探讨这类体裁的作品，大致可见南来友联诸人在当时独立自治运动如火如荼进展，以及华侨在认同纠结的时代氛围中的复杂情感。本文拟以方天在马担任《蕉风》主编时期发表与刊载的寓言与童话为对象，探讨半个多世纪前，因国共大分裂的中国因素促成的马华文学与非左翼南来文人的家国叙事与想象。

关键词：冷战、寓言、童话、理想国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WWII, Cold War began and China fell into the mire of civil war which was fought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is gave birth to the third power literati. In October 1949,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Groups of literati in the non-leftist literati circle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followers of the Chiang Kai-Shek regime, the third force literati and also the liberal literati. Followers of the Chiang Kai-Shek regime retreated and based themselves in Taiwan. The third force literati and the liberal ones flocked to Hong Kong and established many publishing houses there. Union Publishers was one of them. Union Publishers linked up with Asian Foundation in January

* 章丽君 玻央师范学院讲师。电邮地址：chianglkwn@yahoo.com.my

1953 and founded *Jiao Feng* magazine in Singapore at the end of 1955. Since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was behind Asian Foundation, Union Publishers was thus being tagged as “a rightist organization with the influence of American Dollar”. *Fang Tian*, son of on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founding fathers *Zhang Guo Tao*, was one among the many Hong Kong Union Publishers’ writers that had migrated south. When *Fang Tian* was the Chief Editor for *Jiao Feng* magazine, he had published many fables and fairy tales in the magazine. By exploring these literary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sociopolitical situatio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at that time, they reveal a mixed sentiment of the Union Publishers’ writers concerning the independent movement and overseas Chinese identity. This article, with the study of the fables and fairy tales in *Jiao Feng* magazine edited by *Fang Tian*, intends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Malaya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non-leftist literati’s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of their home country, which were caused by the rift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Keywords: cold war, fables, fairy tales, ideal nation

一、前言

马来亚新邦初建，新加坡在自治途中，南洋新社会的发展，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时势，是人间净土？是革命疆场？他了解了多少？（白垚2016：39）

随着二战结束，冷战紧接着打开序幕，大陆陷入国共内战的泥沼中，催生了第三势力文人¹。这批文人在政治上属于非左翼。内战初期，左派的文协（中国全国文艺协会）遭到国民党的铁腕对付，《文协港澳分会》于1946年中在广州被查封，左派文人纷纷南下香港。（黄傲云，1990）然而，1949年7月2日，随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批作家大部分北归。（同上）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国民政府被迫追随国民党撤退至台湾。这时期，非左翼文人圈中出现了有追随蒋政府的文人，有第三势力文人，以及自由派文人。追随蒋政府的文人退守台湾，而第三势力文人，以及自由派文人涌入香港。涌入香港的文人与之前的左翼文人不同。他们没有组织的支持，大部分是一穷二白；他们从不以香港为家，意识形态与表现是纯中国大陆的。（同上）他们为兴趣和使命感而从事创作；他们为让香港学生在开拓中国新道路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创办刊物。（黄子程主访，1988）他们创办的出版社有：人人出版社、友联研究所、友联出版社等。1953年1月，友联出版社与亚洲基金会接上关系。²亚洲基金会背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因此，友联出版社被视为带有“美元文化”背景的右派机构。1954年，香港友联机构在新加坡设立分部，并于1955年搬迁至吉隆坡。随着友联出版社在新马的成立，这批文人当中的一部分又

¹ 韩战爆发后，美国不能亲共，又不愿支持台湾，为寻求一个既反共又反蒋的政治势力，另辟蹊径。1950年初美国国务院巡回大使吉普赛（Philip Jessup）对记者说：“美国希望中国出现第三势力”，这便是第三势力的由来。（周言，2013年9月5日）

² 根据何守信，友联出版社是在美国对第三势力大失所望之余产生的。它是美国人在钻石山一个单位的资料室里看到了几个孜孜努力于写报告和摘资料的大陆青年流亡学生，认为他们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便决定给予援助。（同上）

从香港再往新加坡和马来亚发展。他们相继在新马创办了《学生周报》和《蕉风》。根据友联出版社创办刊物宗旨的介绍册子，友联的目标主要是“对抗共党的颠覆活动”和“影响大陆局势，促使中共政权结束”。（也斯1988：103-104）而吊诡的是，国共内战前后南来的文人在《蕉风》创刊伊始既高举“创办一份纯马来亚的文艺刊物”（本社1955：2）的旗帜，以开拓马来亚这一片“文化沙漠”为宗旨，并强调“在今后优良的岁月里，我们还要与其他马来亚民族协调地生活在一起。……对于我们生于斯，居于斯、葬于斯的马来亚，如果不够了解，岂不被人引为笑谈！”。（同上）再者，《蕉风》由新加坡蕉风出版社出版，创刊时期其主编是南来作家方天，其主编年份是1955年至1958年³（林春美，2000年9月19日；马汉，1955）。方天原名张海威，是当时中共先驱人物张国焘的儿子。（姚拓，2003）对于方天在星马的名气，已故马华儿童文学家马汉在〈怀念方天〉有这么一段叙述：

听见方天这个名字，对一个热心文艺，正在写作道路上开步的少年（按：当时的马汉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人），真有些“如雷贯耳”的感觉……所以面对着这位令我钦仰的作家，使我立刻肃然起敬。（马汉1995：21、25）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方天主编《蕉风》期间，《蕉风》出现了不少的寓言与童话。短短的一年，即1956年3月至1957年1月就刊登了22篇的寓言，1篇的寓言剧及4篇的童话。⁴若与其他年段相比，这时期的《蕉风》可说刊登最多寓言与童话。这种情况与马来亚战前杂文“祛魅除迷”和战后小说救赎之说具相左之处。在詹明信的“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寓言”论里提到：“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2013：428）为此，本论文提及的“寓言”概念也涵盖了寓言性小说。若结合当时星马的社会与政治氛围来探讨寓言与童话这类体裁的作品，大致可见方天与南来友联诸人在当时独立自主运动如火如荼进展，以及华侨在认同纠结的时代氛围中的复杂情感。针对战后马华文学现象，庄华兴如此形容，“作品精神基调开始出现一种不定性、飘忽、迷茫、失落的状态，追问‘何处江山’或‘乡关何处’和寻求人间净土成为唯一的精神寄托。”（2015：204-

³ 针对方天究竟编过多少期的《蕉风》，各有说法。姚拓、小黑、朵拉〈四十二年来来的《蕉风》〉一文所附录的历任编辑表把方天划入1955-1956年；林春美在《出土文学系列3：方天外传（辑3）形象方天，以及他的时代（上）》提到：《蕉风》庆祝创刊38周年举办的一项活动上的展览资料，方天是“从第1期编到第24期”，然而在她摇电话给姚拓时，姚拓却提到《蕉风》是在方天离开新加坡之后才迁到吉隆坡，所以，只要《蕉风》是在新加坡印刷的一天，执行编辑都是方天，因而从《蕉风》版权页上印刷的地点变更，林春美推断方天编辑《蕉风》的年代应该是至1958、1959年。据马汉的〈怀念方天〉，方天是于1957年杪或1958年初离开。而姚拓的〈黄尧书画童趣横溢〉（2000年12月22日）写自己1957年到新加坡，在《学生周报》做主编。斟酌以上几个观点，和与《蕉风》的篇章对照，笔者认为方天最有可能离开的年代应该是1958年初。1958年8月，《蕉风》出版社在吉隆坡八打灵成立印刷厂，因此《学生周报》和《蕉风》一并从新加坡搬到吉隆坡。与此同时，方天也跟随其父亲张国焘移民到加拿大去教书，大约逝世于80年代。（姚拓，2003）

⁴ 其刊载日期、作者和篇章题目，可参见附件。

206) 由是, 本文拟以方天在马时期在《蕉风》发表及编辑的寓言与童话为对象, 探讨半个多世纪前, 因国共大分裂的中国因素促成的马华文学与非左翼南来文人的家国叙事与想象。为了更好地进行论述, 本文也结合了方天刊登于《中国学生周报》、《学生周报》和《海澜》的作品进行讨论。

二、理想国构思的产生

方天和友联诸子的理想国之思, 若深入探讨, 可追溯至第15期的《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10月31日, 当时的编者在《中国学生周报·学坛》发表了〈苦闷在折磨着我们〉, 呼吁当时处于苦闷的青年们: 立定开山的决心, 尽快确立自己的方向, 举起手中的斧头, 把苦闷化成力量, 以实现自己的远景。⁵这篇文章首先引起了卢绍萱的回应。他(1952年11月7日)向编者提出了“山怎样开? 路怎样平?”的问题。这问题, 经编者的呼吁, 在接下来的几期, 引起了读者们在〈通话站〉展开热烈的讨论。参与讨论的除了《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者、接线生, 读者计有思平(1952年11月14日、1952年11月28日)、周宏毅(1952年11月21日)、浩然(1952年11月21日)、念箴(1952年11月28日)和萧丽(1952年12月19日)。这问题讨论了月余, 由于成效不大⁶, 最后由接线生为之作结, 暂时结束有关问题的讨论。⁷为了安慰及激励参与讨论的读者, 编者(1952年12月12日)在接线生作结之后, 即在第21期发表了〈我也谈谈开山平路〉。然而, 萧丽似乎对这“开山平路”课题的讨论意犹未尽, 他(1952年

⁵ 白垚在《缕云前书(上)》提及了几个年轻读书人在难民木屋区的一间陋室内聆听文化老人何鲁之对文化工作的阐述, 当时石诚志浓眉上扬, 问老人: “未来的艺术应该是一种怎么样子的艺术呢?”老人回答“艺术使冷的理性转化为生气蓬勃的感性, 使忧郁、烦闷、绝望的心灵留着一线生机。未来的艺术应当朝这个方向开展。”继而, 老人皱蹙的脸, 显得相当苍白: “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打起精神好好干, 披荆斩刺, 任重道远, 这根文化运动的接力棒, 此刻就交到你们的手上了。”燕捷的头越来越低, 她强烈的感觉到, 老人的话具有千钧重。老人用潮湿而高兴的目光, 对直看着程维苍。他好像要极力阅读写在这年轻人脸上的某种特殊东西。“那么, 我们今后努力的目标呢?”程维苍问。“从民间来, 到民间去。”老人仰首望天, 天宇高爽, 正是亚热带雨季来临前明朗美丽的好晴天。“在新的跑道上, 努力尽你们的本分。”(白垚2016: 35-36)或许因为这样的一种原由, 《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者, 发表了这一篇〈苦闷在折磨着我们〉。

⁶ 当时的讨论结果, 根据接线生的归纳, 大致可列为四项: 第一项, 为什么要开山平路? 因为它阻碍国家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 窒息了青年们的日常生活, 使他们经常受着苦闷的折磨; 第二项, 要开的是什么山? 要平的是什么路? 要开的山是集封建、专制, 权极之大成而凝结, 而每块石子都具有自私、腐化与堕落的成分; 要平的路, 是使国家通往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 使青年们顺利走向真理的通路; 第三项, 山要怎样开? 山要大家来开。而每个开山的壮士, 必须立定决心, 先把自己心中的山炸掉, 显出广阔的平原, 然后再以恢弘的气度影响别人, 帮助别人也把心中的山炸掉; 第四项, 路要怎样平? 路也要大家来平。平路事件艰巨的建设工作, 决不是单枪匹马所能胜任, 需要集结广大的人力来共同努力。同时通往理想境地的公路也绝没有捷径, 必须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如果想要偷懒取巧, 找个近路, 便常常会走错了方向, 这是十分危险的。从以上接线生所归纳的结论, 再加以归结, 笔者发现“山怎样开? 路怎样平?”的问题讨论, 只明确了青年们内心苦闷的原因, 知道要消除时代所给予的苦闷, 必须先由个人做起, 去除心中的自私、腐化与堕落, 继而影响别人, 推动并结合大家的力量, 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做。然而, 实际的, 或具体的策略却仍理不出头绪, 因此, 笔者将之视为“成效不大”。

⁷ 参阅接线生(1952年12月5)。

12月19日)于接下来的第22期发表了〈怎样认清方向?〉。这段“山怎样开?路怎样平?”的讨论,虽未能掀起巨大的回响,但却为后来方天和友联诸子的“突变”埋下伏笔。它推动着青年们去思索自己的问题,并自己寻求解决方案。这正如萧丽在〈怎样认清方向?〉所言,这个讨论“证明了中国学生的蛰伏生活要提前结束了!要求新生了!”(1952年12月19日:第2版)1952年12月19日,《中国学生周报》里出现了《一代哲人——罗素》和《青年人是否要读哲学》这两个篇章。显示了,友联诸子开始从西方哲学寻求出路,这或许也可作为友联诸子后来接受美援的其中一个原因。检视当时的《中国学生周报》,笔者发现真正具有推动力,使方天和友联诸子理想国的整个图景更为明确的,当属钱穆(1953年3月27日)的《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国青年》所引起的回响。

钱穆在《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国青年》里提出了值得中国青年深思的问题:

今天流亡在海外的中国青年们,似乎无不同声一致,反对这几年来中共大陆政权对自己祖国历史文化之刻意摧残和存心曲解的。……但试问:一旦大陆变动了,我们重回大陆了,我们对自己祖国以往的历史文化,把什么的态度什么的意见,来纠正此刻大陆的种种措施呢?来重新宣扬自己祖国历史文化种种内涵的意义,以及种种实际的过程呢?”

(1953年3月27日:第2版)

随着钱穆的这一段话,《中国学生周报》的编者——方天,于1953年4月3日,即接下来的一期《中国学生周报》刊登了〈到理想国之路〉⁸。这篇文章似乎回应了钱穆的问题,同时也明确了方天和友联诸子的理想国构思之产生。为此,1953年可说是一个转捩点,是友联诸子从最初的“产生一种文化运动,促使中共政权结束”而正式“踏上了构筑理想国之路”的开始。换言之,若相较于《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之初,此时的方天和友联诸子更为清楚地知道了自己所要构筑的自由世界是个怎样的自由世界⁹。

那么,方天和友联诸子所期望的自由世界——理想国图景又是怎样的?〈到理想国之路〉这篇文章或许能给予我们答案。文章中,方天为人们介绍了当代英国大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对人类祸患的根源和挽救当时的浩劫的看法和主张。

⁸ 对于〈到理想国之路〉的作者罗素和哲学对于青年人的重要性,《中国学生周报》早已于1952年12月19日,即第22期的《中国学生周报》就已提出,各以〈一代哲人——罗素〉和〈青年人是否要读哲学〉为篇名,其各自的作者是余仁和秦梦潇。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友联诸子极其重视哲学,并推崇罗素的主张。虽说他们早已介绍罗素和说明哲学对于青年人的重要性,然而他们真正的理想国大蓝图,却是在方天主编《中国学生周报》时期翻译的〈到理想国之路〉中达到具体化。

⁹ 其实在这之前,友联诸子也提及他们要建构的大厦(国家)的蓝图,那就是新生的民主中国,政治民主,经济公平,文化自由——没有人使用暴力来阻拦大家,大家可以自由的操作,自由的开拓,自由的创造。参阅〈自己来建座大厦〉(1952年11月14日)。显然,这是随着编者在第15期的《中国学生周报·学坛》发表了〈苦闷在折磨着我们〉和读者卢绍萱回应,并提出“山怎样开?路怎样平?”之后,编者所作出的回应,然而却没有进一步说明其具体的措施。

罗素（1953年4月3日）认为凡是有真爱的地方，如果能与智慧结合，便能产生人类所期望的规律。然而，在现今的社会，“爱”已被扭曲，不能完整地传达其正确的含义。罗素将行动分为两类：一是，接近的行动；另一，则是远离的行动。接近的行动，在心理学上称为相吸的情绪；远离的行动，则是恐惧的情绪。这两种情绪对于求生者来说，是需要的。过去人类的敌人是自然界的灾害，然而现在人类必须与之搏斗的动物，则是人类自己，而人与人之间产生畏惧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自身的恐惧在作祟。根据罗素（同上），这种恐惧由于无法获得适当的发泄，于是向社会的周围宣泄，产生仇恨、嫉妒、不信任、恶意，以及一切不仁慈的行为。对于罗素以上的观点，方天颇为认同。方天认为现今人类的祸害是集权统治。集权统治不仅对当时的中国，就是对全世界的自由人士而言，皆可说是巨大祸患。根据罗素（同上），人希望控制别人，因为他害怕别人处在控制地位会不公平地做些伤害他的事。这种心理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祈求安全——而这种企求是由人的不理性的恐惧心所引起。要解决这个问题，罗素（同上）认为，人们必须勇敢和有智慧，并把这两者具体表现在社会组织上，让个体产生安全感，养成一种庄严的心理。罗素认为，对于接近的冲动，必须给予鼓励；而对于退后的冲动，则必须加以抑制。除此之外，罗素也表明人类因为征服自然，所以才能用友善与合作的态度相处。若人类本其理性互相合作，把科学知识充分利用，那么，人类将能全体获得经济上的福利。为此，他提出了要走向理想国，“一方面要靠政治，一方面要靠个人的改变”（同上：第2版）的主张。罗素的这一主张正好与方天及友联诸子接受“美援文化”和“山怎样开？路怎样平？”的讨论宗旨不谋而合。

由于罗素的主张触及人的心理、传统、教育、以及环境的榜样等等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因此，要解决以上问题极为不简单，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乌托邦的空想。为此，罗素提出了其解决方案，即“先由各人祛除恐惧与仇恨的心理开始，进而建立一个国际政府止”。（同上，第2版）罗素预料国际政府必须由美国担当。至于个人方面，罗素认为要使“他”不易于产生恐惧与仇恨的心理，必须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着手。根据罗素，人世间的许多仇恨，是由于消化不良，以及腺素分泌功能失调所致。而这两者，又是在年轻时受到压迫与压抑的结果。因此，在一个世界里，如果我们能对年轻人的健康给予适当的照应，如果我们能让年轻人的冲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泄，而不伤害他们的健康，那么年轻人一定能变得更勇敢，更少恶意。对于罗素所提的这种解决方法，方天持乐观态度，认为虽不足以救急，却可达到人类和平、康乐、进步之大道。方天（1955）这一态度的表现可从《一朵小红花》里的〈编印《中国学生丛书》话〉窥得。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方天认为全在于发展精神生活。自由生存，是精神生活得以充畅发展的前提。精神生活，可以分为创造与欣赏两方面。这两方面实际上融为一体，即创造之中有欣赏，欣赏之中含有创造。创造行为的产品是“价值”。若所创造的是物质价值，人生还只维持在“自由生存”的消极意义；若所创造的是精神价值，人生将被赋予积极的意义。精神价值指的是真善美之中的真与美两方面。“善”是“自由生存”的属性，它使人生接近“合理”，“真”与“美”则能使合理的人生进一步充实而有光辉。由于在“美”的创造上，青年人比中年人、老年人敏锐，更能大放异彩，因此，方天（1955）与友联诸子把服务对象投射在“学生”，即少年儿童身上。

三、理想国追逐之旅——马来亚

1955年11月10日,《蕉风》于马来亚创刊。创刊伊始方天与友联诸子即以“文化沙漠”套在马来亚的文化土壤上,并怪罪于一般社会人士对文化事业的不够重视和马华文化工作者在提倡方面不够主动,因而提出了“与其他马来亚民族协调地生活在一起……必须深入到社会内层,浸润在实际生活之中”(本社1955:2)从中慢慢体会——这种解决方法,而这种方法也正是方天与友联诸子所标榜的“纯马来亚化”。文化处于心理和政治之间,它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在马来亚由于其文化中存在着殖民主义的残余或者说它造成的习惯,由是,方天在《蕉风》创刊伊始,即如此提出,可视为《蕉风》创刊之目的负有进行“文化革命”的任务,即“通过消除一系列‘文化臣属’的习惯和品质,产生一种真正的、独立的主体性和集体性”。换句话说,在殖民化经验下,当时的马来亚华人社会处在智力卑下和顺从遵守的习惯和品质中。根据詹明信(2013),这种“文化臣属”尽管控制心理,但不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它是由经济和政治关系客观决定的心理结构。(詹明信,同上)它具有罗素所说的,奴隶的畏缩与激愤的恐惧(编者,1953年4月3日),用纯粹的心理疗法是不能奏效的,因此,要克服这些“‘文化臣属’的习惯和品质”,必须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来理解其残余和影响,进而进行“文化革命”,才能使人们养成一种庄严的心理,重拾主人的那种平静的尊严。

方天决定跟随余德宽到马来亚开拓市场的原因,除了因为对当时香港社会人情冷暖的失望和友联与美援的关系,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原因是,方天很大可能受吴德耀¹⁰的影响。在方天于《中国学生周报》当编辑之际,吴德耀一共发表了7篇作品,即《生活与思想·谈马来亚华文教育》(1953年6月26日)、《生活与思想·谈马来亚华文教育(二)》(1953年7月3日)、《打开一条新出路》(1953年7月24日)、《生活与思想·生活——有意义吗?》(1953年7月31日)、《生活与思想·今日大学教育的大前提》(1953年8月14日)、《南洋大学生的使命》(1953年9月4日)、《打破东方和西方的观念》(1953年9月18日)和《读华文?读英文》(1953年10月9日)。这7篇文章,除了第6篇《打破东方和西方的观念》,其他6篇都谈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教育、侨胞状况和大学生的使命。有关文章表达了吴德耀对马来西亚教育与未来所持的乐观态度及对当时的年轻人的希望。在《生活与思想·谈马来亚华文教育》中,吴德耀分析了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华文教育危机,然后于《生活与思想·谈马来亚华文教育(二)》阐述一件事有了危机必有转机,他以自己的观察为证说明这个转机已经

¹⁰ 吴德耀教授是广东文昌县人,当时36岁,马来亚出生的华侨,早年在南京金陵大学求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得政治学博士,并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讲师数载。胜利以后,在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及联合国秘书处服务,并曾担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设立之计划委员会、程序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的主席。1951年春,应马来亚联邦政府礼聘,考察马来亚的华侨教育,与芳卫廉博士合撰《芳吴华文教育报告书》,甚受各方重视。当时,吴教授在美国哈德福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并任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海外文教服务社秘书等职。方天对吴德耀所撰写的篇章的重视可从1956年6月19日的预告《吴德耀教授精作数篇——本报自下期开始刊载 请南洋同学及关心侨教人士注意》看出端倪。参阅编者(1953年6月19日)。

在南洋发生了¹¹，补缺、改良的工作已经开始，并希望马来亚的华文教育能继续发展，同时拥有良好的效果。他提出了补救及如何继续发展的方法。吴德耀认为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前途是光明的，发展的机会亦无穷无尽。因而，他鼓励当时处于“‘文化界’大都市的浪荡堕落者”（吴德耀1953年7月24日：第2版）的香港读书人到南洋小城市间去，帮助当地的侨胞，并为自己打开一条新的出路。在〈打开一条新出路〉里，吴德耀提到，南洋需要领导人才，“尤其是小城镇间的侨胞，很迫切地需要领导人才出来和他们共患难，并领导他们和其他民族共同合作，为大众的福利打算”（同上）。文章中，吴德耀相信这种领导人才在年轻同学中不少，因而鼓励读书人“挺起背脊，跨开大步，到南洋小城镇间去，打开一条新出路来”（同上），他认为只有这样，年轻人的“领袖才能像璞玉一样，经过琢磨必能成为创造新环境的器皿。”（同上）若根据本雅明，“大都市的浪荡堕落者”即是废人，废人一般上只会对废墟世界作出哀悼，表现的是无能者面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反抗方法。然而，从吴德耀的这一番话，年轻人如方天得到的意识是，与其像无能者般，只会对废墟世界作出哀悼以示最后的反抗，不如到南洋小城市间去，打开一条新出路来。为此，笔者认为方天受吴德耀的启发才决定跟随余德宽到马来亚主编《蕉风》。这可以方天一到南洋便走向乡野，融入当地人们的生活中为证¹²。从《蕉风》的发刊词我们也可窥见方天从未放弃构建理想国这目标。¹³构筑理想国必须“先由各人祛除恐惧与仇恨的心理开始”（编者1953年4月3日：第2版），而创造精神价值则是友联诸子的思想境界。方天通过吴德耀的篇章，发现当时的马来亚正好具备了自己与友联诸子发展人生积极意义的基本条件：自由生存，即精神生活充畅发展的前提。在马来亚，侨胞已经事先创造了辉煌的物质价值——自由生存条件，所匮乏的是精神文明的创造。（方天，1955）因此，自由生存这前提将有助于方天和友联诸子积极地给人生赋予意义，即创造精神价值。张锦忠（2015年8月31日）曾就方天深入生活给予赞许。贺淑芳（2013）为方天于《蕉风》创刊伊始就打着“纯马来亚化”的文学旗帜，惊讶于方天的地方的认同感产生之快速。而林春美（2000年9月23日）则对于新客身份的方天和友联诸子于《蕉风》创刊伊始，就标榜“纯马来亚化”，感应“时代的召唤”提出了不解。或许这一切的解释，可从马汉（1995）的〈怀念方天〉窥见端倪。方天在写给马汉的信中提到：

¹¹ 在〈生活与思想·谈马来亚华文教育（二）〉，吴德耀写道：“华文教育的缺点已引起侨胞人士的注意，改良步骤已开了端。统一华文教育机构的组织正在酝酿着或已经组成了”。（1953年7月3日：第2版）

¹² 方天在《烂泥河的呜咽》的〈后记〉中写到：“为了写这些篇小说，我也曾去参观矿场；看过割胶；到十八溪墘散步，看苦力们奔忙，听他们谈话；到大船船厂看新完工的大船下水，和船工的孩子在水中栽迷子嬉水的情形。但是，仅从旁观看，当然是不够；何况因为其他工作的繁忙，连看个痛快的晨光也没有呢！所幸，有些久居马来亚的朋友们，知道我是新客，便热心地告诉我许多马来亚风土人情，以及各行业的内情及掌故；而我一旦遇到这样能谈的朋友，也一定硬抓住不放，和他聊上几个钟头。这样才收罗到一点起码的知识及材料。”参见方天（1957b：141）。

¹³ 在〈蕉风吹遍绿洲〉里，作者提到“我们的祖先在马来亚这沃野上，对物质文明的创造方面，已有了辉煌的建树；但是在精神文明的创造方面，还不能等量齐观”（1955：2）若与方天（1955）《一朵小红花》里的〈编印《中国学生丛书》的话〉对照，我们将可发现方天与友联诸子虽然转移阵地到马来亚但他们没放弃理想国之追求与构筑。

XX: 因为忙, 未曾立刻复信给你, 谢谢你的盛意, 本来我很愿意到麻坡居住一个时期, 多了解一点马来地方的情形。……最近比较少发表同学投稿, 并不是有什么“门户之见”, 而是因为初办时, 想打开销路, 故多登些星马常见的作者文章。其余, 则就哪一类文章欠缺的, 余先生及我临时补充一点。例如二期之《孕妇岛》, 即为我照你的原作改写的。因为《蕉风》需要此类文字, 我便冒然这样作了, 一方面是为今后写“传说”者, 开一个“式样”, 有了第一篇, 也许有更多好的, 会源源而来。至于诗, 也是因为来稿中缺诗, 故拉了马摩西、江韵等硬写, 自己也赶写一篇。“挖蚝”而成“挖蚶”, 实在是一个大错, 所幸两样事件, 所生之感喟则是一样, 而该诗之主题, 也并不在其挖蚝或挖蚶, 而在此种生活给人的感想。……”(马汉1995: 22-23)

从以上信函内容来看, 方天一来马来亚就书写本土题材, 可说具有策略性, 与美援亦不无关系。1956年至1957年, 美国在三方面调整其海外华人政策, 香港和台北美国新闻处在这政策的指导下逐渐作出调整, 形成了1956年至1962年之间对东南亚华人进行宣传的具体政策。与1956年之前的宣传政策相较, 其变化有三方面: 一是、增加促进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目标¹⁴; 二是、“促进华人支持台湾”的政策不再成为主要目标, 同时也规定其不能与促进华人融入东南亚当地社会的目标相矛盾; 三是、“反中共”与“扬美”目标此消彼长。(翟韬, 2013) 其中, “纯马来亚化”就与第一个“增加促进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目标”有关。这一点, 方天在《蕉风吹遍绿洲——创刊号》提及。(本社, 1955) 由是, 为打开《蕉风》的市场, 方天选择多登些星马常见的作者文章; 为凸显《蕉风》的纯马来亚化, 方天冒然改写与本土生活有关的篇章。而张锦忠所赞许的——方天深入生活, 则可说是方天想通过这一个途径, 带领南洋青年共创一个新环境。¹⁵这新环境与方天和友联诸子的理想国有关, 即帮助南洋青年了解环境, 祛除各人恐惧与仇恨(文化臣属)的心理, 达到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的好办法, 然后共同建立一个以美国为国际政府的理想国。

¹⁴ 根据“USIS-Hong Kong Country Plan, September 10, 1961, RG 306,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Foreign Service Dispatches, 1954-1965, Box 3 NARA.”, 美国海外华人宣传政策的目标是要海外华人“帮助创造或保持一种思维模式, 即他们只有尽快且充分地融入居住国的国民生活和文化之中, 成为忠诚的公民从而将自身利益与居住国的利益视为一致, 才能实现其最大利益。”(引自翟韬2013: 7)

¹⁵ 参见陈正茂主编《50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史料蒐秘》由冷生之文可看出, 《自由阵线》对第三势力组织结构之基调乃是, 第三势力的组织形态必须是一个革命政党的组织, 而不是一盘散漫的政治团体、或派系集团。组织必须走群众路线, 而不能闭门自守的与群众隔离、架空。——这或许除了余德宽所说的走本土路线是为了销路, 应该与方天一来马来亚就走向民间有关系。另外, 基于组织是群众政治理念相结合的最高形式, 为要正常的行动和有计划的领导群众, 必须要有统一的纲领和严明的纪律, 唯此纪律的规范是可以透过自觉的、民主的原则来形成。(张炬人, 民国40: 3-4) 最后, 则为组织的性能, 不应该只是一个党的性能, 或政治性同盟的性能; 第三势力以为它应该是要具有全面改造社会的机能。(《第三势力运动的现阶段》, 民国40: 5)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方天为了迎合美援需求打开《蕉风》市场，打造“纯马来亚化”文化环境，让南洋青年能在经济自由、文化富足和自由的情况下，与其他族群团结一致，共同携手创造一个以美国为国际政府的理想国，他除了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在自己固有的生活上向外延伸和扩展，同时也在个人的生活岗位上处处留心，时时注意。易言之，方天不光是让自己经历相关的生活，同时也通过留心 and 洞察来深切及丰富自己的本土生活经验，使自己的作品发挥影响力¹⁶，从根本上帮助南洋青年认识马来亚，找回自我，认同马来亚为自己的国家，并与巫印文艺界积极联系¹⁷。这除了可促进“纯马来亚化”，同时也可方天和友联诸子构筑理想国之追求搭建桥梁。

在担任《蕉风》主编期间，方天创作了不少新诗、小说、理论等，并刊登于《蕉风》，同时也为香港高原出版的文艺期刊——《海澜》写稿。（马汉，1995）方天在《蕉风》发表的小说不下20篇，都是以星马（以星洲为主）下阶层人民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写实作品，如《胶泪》、《豆腐档边》、《十八溪墘》等¹⁸篇。这些篇章广泛地表现了星马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自由生存”的属性，尤其是前面几篇：《胶泪》、《豆腐档边》、《十八溪墘》、《暴风雨》、《一个排字女工的日记》凸显了星马下阶层人民现实生活的实际面貌。然而，“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是不再能举例自己所最关心的事情，告诉别人自己所经验的，自己得不到别人的忠告，也不能向别人提出忠告的孤独的个人”。（本雅明1963：295）小说形式可以反映现实，但无法以文艺的力量去批判现实和改造现实。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方天来马来亚后，只写了三篇¹⁹反映马来亚各籍贯日常生活小说，就改变书写小说的形式，将寓言性植入小说中，使其在叙述生活的当儿，也能激发读者运用自己批判性的思维获得启迪。其极具寓言性的小说，计有：《一个大问题》、《垃圾堆上的孩子》、《暴风雨》、《烂泥河的呜咽》、《三只小猫》和《预感》。对于“寓言”的概念，詹明信解释道：

我们传统的寓言概念……是一系列精心构想的修辞和拟人化的寓言，应该按照一对一的同类对应表来阅读：……，但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更惊人的想法，就可能使它处于运动状态并使之复杂化，因为这种对应在每一个持久存在的文本里本身会不断变化和改变。（王逢振2010：134）

因此，若按照以上这种扩展的方式阅读，寓言模式不再只局限于道德故事，其故事完全可以像小说的叙事结构那样以新闻体的方式描写。但是，寓言的精神是非常不连贯，充满断裂和异质性，像梦一样有多种解释。因此，詹明信主张第三世界的写作是文本对它的语境说话：“它必然直接对斗争的境遇说话并谈论这种境遇，而这种境遇就是在帝国主义及其影响的语境里为民族独立和文化自主而斗争的境遇”。（同上：135）

¹⁶ 对方天而言，文学的本身是具有世界性与人类性的，而真正伟大的文学一定要从养育它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申青等，1957）

¹⁷ 方天认为以往的马华写作界自己搞自己的，与马巫文艺界，马印文艺界缺乏积极的联系。（同上）

¹⁸ 有关篇章的刊登日期和版位参见附件。

¹⁹ 这里指的3篇小说是：《胶泪》（胶工）、《豆腐档边》（客家）和《十八溪墘》（福建）。

根据笔者的观察，方天改变其书写小说的形式，尤其是将寓言性植入小说中，主要原因还是方天发现通过纯小说形式，马来亚人民原有的“自由生存”的属性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尤其是当马来亚准备步入独立，华裔在公民权申请方面面对种种问题和状况时，他必须把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结合起来，让其小说能赋予它（小说）最苍白的证明（辩护），让它（小说）所提供的合法性与现实性截然对立，才能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南洋青年找回自我，祛除心中的胆怯与仇恨心理，融入当地社会，把自己当马来亚主人一份子来看待。

1956年3月8日方天书写了《一个大问题》，并于1956年4月5日以辛生为笔名刊登于《中国学生周报》。虽说《一个大问题》如贺淑芳（2013）所言，凸显了在马来亚准备步入独立伊始，当时的华侨在公民权申请方面所面对的各种障碍，及当时各种质疑华裔融入在地的既定成见，包括他族对华裔落脚地（随时可回唐山的抉择）之不以为然。然而，也凸显了华裔一般民众相较于巫裔们对华裔申请公民权一事之漠视和无知。对于巫裔而言，放宽华裔申请公民权条例也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华裔头家在经济上给他们带来的威胁。²⁰对于这一切，根据笔者的观察，方天虽觉得当时的华裔处在被遗弃的和不被公平对待的处境，但他仍为这一处境的改善抱着一定的憧憬和希望。这可从《一个大问题》和《垃圾堆上的孩子》中窥见。在《一个大问题》中甘榜里的小教堂传来召唤人们祈祷的呼声：“真主至大，真主教导我们公平与善，爱你的邻人如爱自己，我们虔诚的信仰，……祈祷的时候到了，来祈祷吧，净洁你的心灵，走成功的道路，……”（1956：6），虽说正如贺淑芳所言：“小说……借助了神的观点来俯视国家体制与个体信仰之间的差距出入，伊斯兰的经文传达公平博爱之意，但实际上政体已经把‘国族’划出等级之分……”（2013：80）然而，对话结束后，方天随即述写哈密·阿都拉和老者哈芝·阿里在小教堂召唤下“转向树林里的小教堂去。”

（方天1956：6）这种叙述看似自然渠成，但不无寓意着解决方案就在其宗教意识中，而且也暗喻了巫裔族群对宗教信仰的特殊重视。公平与善良是人人所追求的。公平的基础就是爱，而善良是“自由生存”的属性，因此，着重创造欣赏的精神价值才是解决彼此问题的关键所在。²¹方天写于1956年4月8日的短篇《垃圾堆上的孩子》也可说明方天对即将独立的马来亚所持的憧憬和所抱的一线希望。篇中的阿狗仔——垃圾堆上

²⁰ 根据“Guide Lines for United States Programs Affecting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December 11, 1957, NARA” 1950年代中期，东南亚华侨大约有1000万，占当地总人口的6%，而绝大多数华侨难以或不愿融入当地社会，被一些东南亚国家视为有碍国家团结和建设的离心力量。美国认为主要原因除了因为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都在积极争取海外华人的效忠，鼓励华人民主主义之外，海外华人本身具有的种族优越感和较强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华侨）成为“造成东南亚国家政治日益紧张的焦点”也是其中一个原因。（翟韬，2013）

²¹ 马摩西曾针对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文化做一对比认为彼此所传承的价值皆能让彼此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对于华人和马来人的文化，马摩西的分析如下：“其实严格地分析起来，华人传统的处世哲学，不出于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况且老庄的无为而治，墨子的兼爱非攻，都足以表露华人忍让的美德。至于马来人自接受回教思想后，他们一直在古兰经和穆罕默德圣训的熏陶下，锻炼宽大、仁爱、和平、忍耐……种种品行，以忠恕为最高的意境。但不幸两族人中的激进分子，专事抄袭现代政治斗争的皮毛，以排除异己为个人渔利的手段。”参见马摩西（1957）。

的孩子，虽处于恶劣环境，三餐未能温饱，但仍怡然自得，对未来充满着希望并抱着乐观的态度憧憬着未来。²²

再者，随着《一个大问题》的刊登，随后的《蕉风》刊载了相当多篇的寓言与童话。综观这些寓言和童话，很多都是针对当时的局势，对人们提出了忠告。剑影的《燕子和喜鹊》（1956）向人们说明人数多，但不懂得争取自由，实则没作用。反映了积极争取自由的重要性；剑影的《山羊和猴子》（1956）说明遇到困难得想办法克服，不是消极地哭，等着别人来救。而其《兔子和山羊》（1956）则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人们道德沦丧的现实性。1956年4月间，马来亚争取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独立建国已经指日可待，但许多华籍人士仍然不被授予公民权，被剥夺了生存发展的权利。1956年10月25日，方天刊登了刘强的“马来亚童话”《断舌的麻雀》，告诫人们冥顽而贪吝，祸由自取，但若吸取教训便可以更新平生的历史。1956年4月27日，联合邦华人注册团代表争取公民权大会于吉隆坡精武体育馆轰轰烈烈举行。方天则于《蕉风》刊登了清农的《猴子与山猪》（1956）和刘强的《百灵鹿的故事》（1956）（马来亚童话）。清农的《猴子与山猪》告诫人们好心未必有好报，说明了对人好也要选对对象，不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把一个不守信用，不讲义气的人当知己而信任，简直就是自讨苦吃；刘强的《百灵鹿的故事》则通过百灵鹿的智慧，凸显处世须临危不乱，并以智取人。

1956年6月初，以李特为首的宪制代表团抵达马来亚进行调查工作，并准备广泛接受各族人士提供书面或口头的意见，华人社团如商联会等都纷纷提呈备忘录，并获宪制调查团接见。然而，方天却于《蕉风》刊登了剑影的《兔小姐搭火车》（1956）提醒我们要对不认识的人提高警惕，即使他很同情我们，愿给我们帮忙，也不好接受；叶新华的《会说话的岩洞》（1956）对人们提出了“远虑是幸福之门，浅见是祸患之根”；向日葵的《狮子和小山羊》（1956）告诫人们要注意表面做事磊落，实则弱肉强食和仗势欺人的现实情况，这三则寓言仿佛劝导人们在提呈备忘录时，必须慎重地考虑所提的事项。另外，仁丁的《蠢驴子》（1956）则讽刺不知醒觉，虽屡次遭遇同样的祸害，但还是沉迷于甜言蜜语中，最后招致祸害的人。1956年，在马来亚走向独立的前夕，在华人教育挣扎图存的当前阶段，在黄色文化侵袭星马、毒害青年身心的当时，劝导人们面对问题时，必须团结一致，计有秋雁《狮子和狐狸》（1956）、叶新华《马与驴》（1956）和鲁巴《麻雀》（1957）。秋雁的《狮子和狐狸》除了要求人们团结一致，也批判奴隶主义。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随着1956年6月的“马来亚化”重大课题，被政客利用，成为使人不寒而栗的观念之后，方天刊登于《蕉风》抗生的《大树与山藤》（寓言）（1956）和刊登于《学生周报》的方天的童话著作《丽丽》（1956年7月27日）这两个篇章。抗生的《大树与山藤》，叙述了大树遮盖

²² 文章充满了阿狗仔对自己未来的想象，例如想象自己长大后成为一个木工、想象自己是水客、想象自己可以跟摇船的阿芳姐到海上去看雄伟的大小军舰和商船、想象自己是一只贪婪的找食的海鸥；而怡然自得方面则可从当他看到一辆货车从街角纸厂的大铁门里冲出来时，孔隆孔隆，转个弯，便放着屁急驶而去时，认为那客货车姿态迅捷美妙，并开心忘神的举起手来比划着搬轮盘——想象自己是那个神气的抓车佬，而不小心让自己的手碰到了正弯着腰拾煤渣的阿桂。阿狗仔对未来的想象和遇恶劣环境中的怡然自得寓意了方天对当时的马来亚状况还抱着乐观的态度。参见方天（1957b）。

并独霸自然给予所有生物的养分（阳光），不让山藤享受应得的权力（吸取阳光）而欺压它，不让他攀高。然而，山藤并不畏惧，忍受着耻辱，日与继夜地不断往上爬，结果超越了大树，享受到了阳光的温暖。说明了要应对这样一种被压迫的生存环境，人们必须咬紧牙根，默默地耕耘，等自己的能力强起来时，就能迎头赶上，甚至超越对方。方天的《丽丽》很好地凸显了方天从事艺术以构筑理想国的理论。丽丽是现代少年儿童象征，有着青春和美丽，然而却因为现代化潮流的袭击，奢望占据着内心，虚荣心由此而生，对物质索求不止。填不满的欲望，因为虚荣，最后使少年儿童产生了享乐的心理，结果虚度了青春，无法找回本真的自我。少年儿童因此不幸福、不快乐。为了使少年儿童幸福、快乐，方天认为应该让他们从事劳作，为社会服务。唯有“工作可以使你的心坚强，坚强的心膜可以把奢望、虚荣、自私这一类坏东西统统隔离，把它最美好的房间空出来，留给美丽。”（方天1956年7月27日：第6版）如上所述，方天和友联诸子把生活分为精神的和物质的，在取得精神生活以前，方天和友联诸子相信，人们必须抱着如泰戈尔所说的：“对物质抱‘澹泊以明志’”的态度。”（杜宇，1953年1月16日）通过方天的童话——《丽丽》，可以发现，要获得“对物质抱‘澹泊以明志’”的态度，唯有通过工作。工作能帮助少年儿童磨去享乐的炙痕，使他们的头脑灵活而有智慧，手有力而巧妙，新生的血充沛全身，青春一分不少地随着血在身中奔跑跳跃。换言之，工作能为少年儿童们赚回生命的财富，而童话对方天而言，可说是儿童文学理论的载体，为少年儿童指出生活的方向，使他们知道怎样更深地体验生活，怎样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突破“文化臣属”这个由经济和政治关系客观决定的心理结构重围，进而养成一种庄严的心理，重拾作为马来亚一份子的那种平静的尊严，找回自我。

四、理想国构筑之幻灭

在方天于《蕉风》的著作中，《暴风雨》（1956）与《烂泥河的呜咽》（1956）可说是方天尝试创造欣赏的精神价值的篇章，文章尽显了华裔勤俭刻苦，在开发马来亚经济方面与大自然、与生活搏斗的辛酸、牺牲和默默忍受的精神。然而，这种创造欣赏的精神价值，却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最后导致“自由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窄。随着1956年6月的“马来亚化”重大课题，被政客利用，极力鼓吹其“马来化”的论调，希望独立后的马来亚，成为纯马来化的马来联合王国，成为使人不寒而栗的观念（慧剑，1956），《暴风雨》结束前，主角回文式的放声厉叫：“呵！呵！为禀个卖命！卖命为了禀个！福仔！福仔！我的福仔！……”（1956：17）和《烂泥河的呜咽》在孙子问起“爹”死后的生活状况，老荣伯“忍着悲酸，把发麻的腰挺起，用干瘪的瘦手使出和生活奋斗了50多年的豪气，狠劲地拍了一下胸膛”（1956：22）回答孙子“……那……那……那还有你的爷爷”（同上），又故作开心的拧了孙子的脸蛋一下说：“而且，你哥哥狗仔和你，不都快长大了吗？”（同上），然后，“老人背过了脸去，一滴泪滚下来，无声地渗入烂泥里。”（同上）寓意了华裔参与国家建设的辛酸与无奈。方天于1957年1月1日发表于香港《海澜》杂志的《三只小猫》“喝！真冷，人家说马来亚的天气一年比一年变冷了，真一点不错。”（方天1957a：9）正

好影射方天欲于马来亚构筑理想国理想之幻灭，而《预感》预示着独立将至马来亚这人种博杂的地方，将临来一场种族之间的争权夺利及反对不利于己的斗争。

紧随着《烂泥河的呜咽》的刊登，方天于1956年10月10日，在《蕉风》刊登了三篇寓言。这三篇寓言分别是韩泰丰的《胖了的猪》（1956）、韩泰丰的《玩火的狐狸》（1956）和陆传的《愚笨的老虎》（1956）。《胖了的猪》，批判自圆其说和忘本的行为；《玩火的狐狸》，嘲讽玩火自焚者；《愚笨的老虎》，则劝诫人们做一件事之前，必须细心考察与认清事情的真相，若只凭着自己一时的呆意去瞎做，结果大大吃亏的终是自己。1956年11月10日，方天又在《蕉风》刊登了三篇寓言：第1篇，斜坡的《汽车和牛》，说明了“鲁莽、骄傲只会招惹祸害，唯有脚踏实地才是最实际，最安全，也最能确保最终达到目的地。”；第2篇，叶新华的《马和驴》，说明了“大家同一条船上，应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不然，一方受伤，或倒下，自己也会没有好日子过”；第3篇，天涯的《狐狸和啄木鸟》，凸显“恶有恶报”。紧接着，1956年11月25日，方天又于《蕉风》刊登了两篇彭立明的寓言：第1篇是《天文家》，批判“只往上看，不往下看的人是没有好结果。说明了狗眼看人低的人，或者只看高不看低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第2篇是《守财奴》，说明“再贵重的东西，若不懂得利用其价值，只是收藏着，就与收藏废物没两样”。若以当时的马来亚局势来看，以上寓言的出现，可说与当时的华人“自由生存”的空间有关。根据曹兮于《再谈马华文艺》的讨论中的发言或许可窥见，当时的华人在马来亚不止常受白种人的歧视，连马来人也学白人的样子来歧视华人。（重阳等人，1956）因此，以上的寓言尽向人们提出忠告，告诫人口驳杂的马来亚人民，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必须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做一件事之前，要细心考察、认清事情的真相，不要骄傲，不要自圆其说、不要玩火自焚，要多往下看，要脚踏实地。唯有这样才能避免自食其果，遭遇恶报。

1956年12月10日，方天于《蕉风》刊登了唯一的1篇寓言剧萧蒙的《编辑室风波》。萧蒙（1956）的《编辑室风波》，凸显了共产党与美国、英殖民、右派、非左翼和友族同胞之间的风波，并说明这场风波，只会暂停，但永远不会停止。这篇寓言同时也预示了，在冷战和国共的意识形态氛围下，马来亚的“自由生存”环境越来越狭窄，方天构筑理想国的希望也相应地越来越渺小，甚至濒临幻灭。对于方天构筑理想国希望之幻灭，除了以上所提的《三只小猫》和《编辑室风波》，方天刊登于香港《海澜》的诗歌〈愿〉（1956a）也显露了端倪。

通过〈愿〉这首诗歌，可以窥见方天从没忘记自己欲构筑理想国之初心。在这首诗中，方天意志坚决地强调不管环境怎样变，外面的阻力多么大，他总是抱着一颗诚挚的心，不辞劳苦；想方设法，排除万难，勇往直前地要与丽丽，还有小黑共同构筑一个世界。“别踢翻我的沙堆，我，丽丽和小黑，嗨！正在构造一个世界。”（方天1956a：28）这种坚决语气的告诫，凸显了方天在马来亚的理想国之路和追求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与阻力。冷战的介入，国共之争和独立前民族主义之抬头，造成了当时的马来亚“自由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狭窄。现实环境的制约，被异化，最后迫使方天只好往童话里筑造他的理想国。1956年12月25日，方天于《蕉风》刊登了自己撰写的童话〈勇敢的孩子〉。由是，〈勇敢的孩子〉可说是方天因国共大分裂的中国因素促成他南来马来亚，然而又因冷战的介入和本土民族主义的崛起，理想国追逐和构筑之旅受

阻和幻灭，只得通过创作〈勇敢的孩子〉将内心的家国叙事与想象倾注于这篇童话，形象鲜明地展现了他的理想国概念——如何在新生代心理祛除个人恐惧与仇恨的心理，然后再建立一个以美国为国际政府的理想国概念。

方天的童话〈勇敢的孩子〉表面上看，是一篇儿童成长童话。这篇童话讲述松鼠木公爹爹和木公妈妈的独生子——小松，怎样在传统的“母爱”（统治极权）的“保护”下，变成了对任何事物都产生恐惧，事事被人嘲笑，毫无信心的孩子，然而在接受了学校老师——琪琪老师的爱的滋润、谆谆善诱和鼓励，并经历了与同学们合作对付黄鼠狼以拯救琪琪老师的事件后，小松由一个内心充满恐惧，胆小怕事的小孩变成了林子里最勇敢的孩子。在这篇童话里方天具体形象地描绘了小松如何在母亲的溺爱和吓唬下，心里的恐惧和胆小怕事的心理逐渐深化。对于小松的胆小，母亲没给予正面的指导，更甚的是为使小松乖乖地听话，木公妈妈也常常用一些吓唬小松的话来使小松心生恐惧，以期达到阻止小松去做木公妈妈不想他做的事。例如，一天晚上，田鼠叔叔和兔子姑妈去他们的家，木公爹爹和木公妈妈端了凳子屋外陪她乘凉述家常。小松喜欢听他们说古，赖着不肯去睡。忽然小松听到咯咯咯几声怪笑，从黑森森的树顶上发出来。小松赶忙扑在妈妈怀里，小头朝妈的衣襟里钻。木公妈妈没抓紧机会消除小松害怕的心理，反而说了以下的话语来吓唬小松：

“孩子，这是猫头鹰！叫你去睡，你不肯，这都是你不听话的缘故，猫头鹰专在晚上出来抓不听话的孩子的魂。快闭上眼，睡吧。闭上眼猫头鹰就不来抓你了。”（方天1956：10）

木公妈妈这样吓唬小松是有目的的：以后小松一听见奇怪的响声，或看见什么黑影子便只知道闭上眼就好了。木公妈妈的这种做法，若与掌权者相较，也可说是一种“极权统治”，若再加上周遭环境的制约与限制，养成“文化臣属”的习惯与品质，孩子们/人民的“自由生存”的属性将被扼杀。

又有一次，木公妈妈白天要陪木公爹爹出去采松果，怕小松出去闯祸，便对他说：

“宝宝，不要出去乱跑，外面有蛇，有黄鼠狼，都是我们松鼠的死对头。”
“什么是蛇，什么是黄鼠狼呢？”小松问。
“蛇好像一条爬墙藤，最会装假；黄鼠狼会放臭气，一下就把我们熏昏过去，见了他们都要趁早躲开，最好是守在家里，不要出去，什么事都不会有了。”（方天1956：10）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小松，渐渐地连门都不敢出，非要妈妈推着才肯向前，这种性格剥夺了小松出去见见世面和学习采松果、撷枣子的独立生存机会。于是方天在故事中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句子：“但是小松的胆子已经被妈妈的话吓掉了”（同上），从而批判了华人传统中父母们对孩子们的“爱”的不恰当和教育方法的不正确，导致了孩子的个性被扭曲。环境的负面反应，进而产生“文化臣属”的习惯和品质，孩子将无

法获得真正的自由。这种恐惧若无法获得适当的发泄，就会在孩子的心中产生仇恨、嫉妒、不信任和恶意。然而，所幸的是，木公爹爹还有一些醒觉，决定把小松送去学校让他练练胆量。在叙述学校里的女老师——松鼠琪琪小姐的特征时，方天用了：很有学问，心地好，又爱孩子，而且长得很美这些赞美的话语，显示了学校教育和教师的爱心、耐心和专业对于培育孩子的重要性。方天以细腻的笔触，条理分明地描述了琪琪老师如何循序渐进地，从鼓励，解围，让小松心存感激，再到通过各种比赛和鼓励来建立及加强小松的信心。然后，再让琪琪老师进一步教导小松和班上同学各种应敌的战术。在掌握了应敌的方法后，方天特意安排敌人——黄鼠狼的出现，让小松和班上同学在实践中，体验成功击退敌人黄鼠狼以拯救琪琪老师的经验。由于这种成功得之不易，小松因此获得了内心的满足和愉悦，成了一个真正勇敢的孩子。综上所述，方天的这篇童话，可说是方天构筑理想国理论之集大成者：它通过木公妈妈不恰当的爱和不正确的教导方式，批判了传统的育儿方式对孩子的心理成长的扭曲；它通过琪琪老师的爱心、耐心、鼓励、智慧和专业，说明了学校作为一个真爱与智慧相结合的场所，对祛除孩子的心理恐惧，培养他们勇敢的心理和增长孩子们的智慧，进而使他们产生安全的场所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说明了正确的爱、教育和实践对培育孩子祛除恐惧与仇恨的心理的重要性。然而，中共的极权统治，马来亚自由生存空间的窄化，对祛除孩子恐惧与仇恨心理是极为不利的，由是，方天毅然通过此文传达了其理论的理念。

从方天〈勇敢的孩子〉中，亦可看到，在启蒙阶段，琪琪老师教导对付黄鼠狼的战术是使用车轮战术引诱敌人。这种战术结合的是大家的力量，而在真正遇到黄鼠狼时，同学们也确实地发挥了团体的力量，但是最后受到肯定、受到赞许的，却只有小松一个。方天的这种描述方式，除了显示培养孩子健全人格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这种健全人格的建立——勇敢与智慧，须通过社会组织让其具体展现，才能使人产生安全感，进而养成庄严的心理。这篇童话通过批判传统、推崇爱与欣赏的教育和环境改善与实践三方面，说明了在构筑理想国过程中，个人健全人格的培养是重要和必要的。因为一个人唯有心正、有道德，而后才能谈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也总要有那几个人、那么一群“少数”人，以他们的“人格”对那个团体或社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文中的小松就是一个例子，他是对付黄鼠狼战术团队中的带动者，他成了大家的重心和代表，因此获得表扬。这种表扬正符合了罗素所说的：对于接近的冲动（相吸的行动），我们必须给予鼓励。因为，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运用征服自然的能力，以友善与合作的态度相处。唯有通过这种理性相互合作，把科学知识充分利用，全体人类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福利。这也是方天理想国的构思，也是其欲带领华人侨胞与本土人民携手共创的理想国。

五、总结

对方天和友联诸子来说，中共掌握中国政权是苏联对中国的侵略，是苏联使中国人民丧失自由，因此惟有驱逐苏联的侵略势力，中国人民才能夺回失去的自由。至于要如何驱逐苏联的侵略势力，方天和友联诸子认为中国必得先使中国的民族文化力量得

到高度的发挥，给人们一种新的自由人生观，要他们明白，自由就是平等，平等的基础就是爱。对于方天和友联诸子来说，华裔这个民族，最爱好自由，而也最能舍身以卫自由。而其具体表现展现于行为中的英勇不屈。而产生这种文化精神的力量，全在于中华民族固执于这个自由观念。因而，一切的智慧与勇敢，就从这里产生。智慧使人们懂得自由和爱自由，勇敢使人们无畏地去保卫它。（江东去，1953年1月2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马来亚独立建国前，大家忙于讨论语文与种族问题之际，方天除了以寓言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忠告之际，同时也于《学生周报》和《蕉风》各刊登了〈丽丽〉（1956年7月27日）和〈勇敢的孩子〉（1956）这两篇童话。这说明了方天和友联诸子从开始的反共、接受美援，至构筑理想国之追求，从没忘记自己的理想。他们着重教育，从文化改革着手，要培育及训练的正是英勇不屈的孩子，因为，唯有培育英勇不屈的孩子民族的未来才得以保障，理想国之构筑才能实现。除此之外，方天也主张以生活为书本：从生活中去学习，从生活中去历练。因为知识透过生活，才能有益于人生；学习经过历练，变成经验，乃可陶养心志，构成学养。沟通学习与生活，使两者打成一片，是陶铸学养的唯一办法。综上所述，童话形式对方天构筑理想国可说相当重要，它即是儿童文学理论的载体，也是其理论实践之集大成者，为中国大陆华人指出生活的方向，使华人侨胞在中共统治之外的马来亚，知道怎样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化”，突破当地的“文化臣属”习惯与品质，恢复精神平衡，从而设定一个非压抑性的新生存方式——理想国。至于寓言，由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已经完全伪形化，无法模仿自然和仿效现实，因此其模式也不再局限于道德故事，反之，扩展成能对自身语境说话，并促进人们反思和改造生活的文本形式。综上所述，方天通过其童话和寓言阐发了自己对理想国构筑的理念，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国共大分裂的中国因素促成的马华文学与非左翼南来文人的家国叙事与想象。

参考资料

- 白垚，2016，《缕云前书（上）》，雪兰莪：友联出版社。
- 编者，〈苦闷在折磨着我们〉，《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10月31日，第15期，第1版。
- 编者，〈我也谈谈开山平路〉，《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12月12日，第21期，第2版。
- 编者，〈吴德耀教授精作数篇——本报自下期开始刊载请南洋同学及关心侨教人士注意〉，《中国学生周报》，1953年6月19日，第48期，第1版。
- 本社，1955，〈蕉风吹遍绿洲（发刊词）〉，《蕉风》，第1期，页2。
- 本雅明，1963，〈讲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随想录〉，陈永国、马海良（编）（1999），《本雅明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291-315。
- 陈正茂编著，2011，《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史料蒐秘》，台北：秀威出版社。
- 重阳、慧剑、海燕、彭松涛、马摩西、曹兮……白蒂等，1956，〈再谈马华文艺〉。《蕉风》，第22期，页3-5。
- 创刊词，〈负起时代责任！〉《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7月25日，第1期，第3版。
- 〈第三势力运动的现阶段〉，民国40年，《自由阵线》，第5卷，第1期，页5。
- 翟韬，2013，〈美国对东南亚华人宣传政策的演变〉，《美国研究》，第1期，页117-137。
- 杜宇，〈性灵的体验与调和〉，《中国学生周报》，1953年1月16日，第26期，第2版。

方天, 1955, 《一朵小红花》, 香港: 友联出版社。

方天, 〈丽丽〉, 《学生周报》, 1956年7月27日, 第1期, 第6版。

方天, 1956a, 〈愿〉, 《海澜》, 第14期, 页28。

方天, 1956b, 〈勇敢的孩子〉, 《蕉风》, 第28期, 页10-12。

方天, 1957a, 〈三只小猫〉, 《海澜》, 第15期, 页8-9。

方天, 1957b, 《烂泥河的呜咽》。新加坡: 蕉风出版社。

方天, 1957c, 〈1957年马华文坛的展望(文艺座谈之五)〉, 《蕉风》, 第29期, 页3-5。

浩然, 〈山要大家来开·路要大家来平〉, 《中国学生周报》, 1952年11月21日, 第18期, 第3版。

贺淑芳, 2013, 〈国之将临, 告别往昔: 方天在《蕉风》的现实主义书写(1955-1957)〉,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 第16期, 页65-68。

黄傲云, 1990, 〈从难民文学到香港文学〉, 《香港文学》, 第62期, 页4。

黄子程主访, 1988, 〈《周报》社长——陈特漫谈周报历史〉, 《博益月刊》, 第14期, 页125-131。

慧剑, 1956, 〈马来亚化是什么?〉, 《蕉风》, 第16期, 页6-7。

江东去, 〈新的岁月·新的认识〉, 《中国学生周报》, 1953年1月2日, 第24期, 第2版。

接线生, 〈让我作个结论·把这问题暂时结束〉, 《中国学生周报》, 1952年12月5日, 第20期, 第3版。

林春美, 〈出土文学系列3: 方天外传(辑3)想象方天, 以及他的时代(上)〉, 《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2000年9月19日。

林春美, 〈出土文学系列3: 方天外传(辑3)想象方天, 以及他的时代(下)〉, 《南洋商报·南洋文艺》, 2000年9月23日。

卢绍莹, 〈请大家讨论这问题: 山怎样开? 路怎样平?〉, 《中国学生周报·通话站》, 1952年11月7日, 第16期, 第3版。

罗素, 〈到理想国之路〉, 编者节译, 《中国学生周报》, 1953年4月3日, 第37期, 第2版。

马汉, 1995, 〈怀念方天〉, 云里风主编, 《文学姻缘》, 雪兰莪: 雪兰莪乌鲁冷岳兴安会馆, 页21-30。

马摩西, 1955, 〈沙漠的边缘〉, 《蕉风》, 第1期, 页3-5。

马摩西, 1957, 〈文艺新使命〉, 《蕉风》, 第36期, 页5-6。

念箴, 〈先把自己的山炸掉·才能打通民主之路〉, 《中国学生周报》, 1952年11月28日, 第19期, 第3版。

钱穆, 〈敬告流亡海外的中国青年〉, 《中国学生周报》, 1953年3月27日, 第36期, 第2版。

秦梦潇, 〈青年人是否要读哲学〉, 《中国学生周报》, 1952年12月19日, 第22期, 第3版。

申青、范提摩、马摩西、司马萍、任重、洁寸、…方天, 1957, 〈1957年马华文坛的展望(文艺座谈之五)〉, 《蕉风》, 第29期, 页3-5。

思平, 〈山要这样开! 路要这样平!〉, 《中国学生周报》, 1952年11月14日, 第17期, 第3版。

思平, 〈关于开山平路的问题——愿与周宏毅同学进一步研究〉, 《中国学生周报》, 1952年11月28日, 第19期, 第3版。

王逢振, 2010, 〈全球语境下的“民族的寓言”〉,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第6期, 总第20期, 页132-141。

吴德耀, 〈生活与思想·谈马来亚华文教育〉, 《中国学生周报》, 1953年6月26日, 第49期, 第2版。

吴德耀, 〈生活与思想·谈马来亚华文教育(二)〉, 《中国学生周报》, 1953年7月03日, 第50期, 第2版。

- 吴德耀，〈打开一条新出路〉，《中国学生周报》，1953年7月24日，第53期，第2版。
- 吴德耀，〈生活与思想·生活——有意义吗？〉，《中国学生周报》，1953年7月31日，第54期，第2版。
- 吴德耀，〈生活与思想·今日大学教育的大前提〉，《中国学生周报》，1953年8月14日，第56期，第2版。
- 吴德耀，〈南洋大学生的使命〉，《中国学生周报》，1953年9月04日，第59期，第2版。
- 吴德耀，〈打破东方和西方的观念〉，《中国学生周报》，1953年9月18日，第61期，第2版。
- 吴德耀，〈读华文？读英文？〉，《中国学生周报》，1953年10月9日，第64期，第2版。
- 吴兆刚，2007，《五十年代〈中国学生周报〉文艺版研究》，岭南大学未出版之硕士论文。
- 萧丽，〈怎样认清方向？〉，《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12月19日，第22期，第2版。
- 姚拓、小黑、朵拉，1999，〈四十二年来的《蕉风》〉，江洛辉主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页76-79。
- 姚拓，〈黄尧书画童趣横溢〉，《南洋商报·余商》，2000年12月22日。
- 姚拓，2003，〈马华文学上的长春树——《蕉风》〉，黄丽芳编，《雪泥鸿爪》，吉隆坡：红蜻蜓出版有限公司，页570-574。
- 也斯，1988，〈解读一个神话？——试谈《中国学生周报》〉，《博益月刊》，第14期，页103-109。
- 余仁，〈一代哲人——罗素〉，《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12月19日，第22期，第2版。
- 詹明信著，2013，《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严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联书店。
- 张锦忠，〈Azeotropia共沸志：小写方天〉，<http://www.nanyang.com/node/720667?tid=493>，2015年8月31日。
- 张锦忠，〈共沸志：再写方天〉，<http://www.nanyang.com/node/723201?tid=493>，2015年9月14日。
- 张炬人，民国40年，〈论第三势力〉，《自由阵线》，第4卷，第3期，页3-4。
- 周宏毅，〈只炸掉自己心中的山·我们还是不够的！〉，《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11月21日，第18期，第3版。
- 周言，〈余英时的香港时代〉，http://hongkongcultures.blogspot.my/search/label/*%E6%9C%9F%E5%88%8A%E7%BC%9A%20%E8%87%AA%E7%94%B1%E9%99%A3%E7%B6%AB，2013年9月15日。
- 〈自己来建座大厦〉，《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11月14日，第17期，第1版
- 庄华兴，2015，〈语言、文体、精神基调：思考马华文学〉，思想编委会编著，《大马华人与族群政治》，台北：联经，页199-219。

附录

1956年3月至1957年1月刊登于《蕉风》的寓言、童话与寓言性小说

序	日期	媒体	作者	篇名	文体
1	25.03.1956	《蕉风》第10期，第27页	剑影	《燕子和喜鹊》	寓言
2	25.03.1956	《蕉风》第10期，第27页	剑影	《山羊和猴子》	寓言
3	10.04.1956	《蕉风》第11期，第12页	剑影	《兔子和山羊》	寓言
4	25.04.1956	《蕉风》第12期，第3-6页	辛生	《一个大问题》	寓言性小说

5	25.04.1956	《蕉风》第12期, 第8-9页	刘强	《断舌的麻雀》	马来亚童话
6	10.05.1956	《蕉风》第13期, 第11-12页	刘强	《百羚鹿的故事》	马来亚童话
7	10.05.1956	《蕉风》第13期, 第22页	清农	《猴子与山猪》	寓言
8	10.06.1956	《蕉风》第15期, 第10页	剑影	《兔小姐搭火车》	寓言
9	10.06.1956	《蕉风》第15期, 第10-11页	叶新华	《会说话的岩洞》	寓言
10	10.06.1956	《蕉风》第15期, 第11页	向日葵	《狮子和小山羊》	寓言
11	25.06.1956	《蕉风》第16期, 第14页	刘强	《两蛙的旅行》	寓言
12	25.06.1956	《蕉风》第16期, 第15页	清农	《猪兄弟》	寓言
13	25.06.1956	《蕉风》第16期, 第1-5页	方天	《暴风雨(上)》	寓言性小说
14	10.07.1956	《蕉风》第17期, 第13-17页	方天	《暴风雨(下)》	寓言性小说
15	10.07.1956	《蕉风》第17期, 第26页	仁丁	《蠢驴子》	寓言
16	25.07.1956	《蕉风》第18期, 第9页	抗生	《大树与山藤》	寓言
17	25.07.1956	《蕉风》第18期, 第13页	不详	《狐狸与猫》	寓言
18	25.08.1956	《蕉风》第20期, 第19-20页	刘强	《聪明的龟》	马来亚童话
19	25.08.1956	《蕉风》第20期, 第22页	秋雁	《狮子和狐狸》	寓言
20	10.10.1956	《蕉风》第23期, 第12页	韩泰丰	《胖了的猪》	寓言
21	10.10.1956	《蕉风》第23期, 第12页	韩泰丰	《玩火的狐狸》	寓言
22	10.10.1956	《蕉风》第23期, 第13页	陆传	《愚笨的老虎》	寓言
23	25.10.1956	《蕉风》第24期, 第20-22页	辛生	《烂泥河的呜咽》	寓言性小说
24	10.11.1956	《蕉风》第25期, 第12页	斜坡	《汽车和牛》	寓言
25	10.11.1956	《蕉风》第25期, 第12页	叶新华	《马和驴》	寓言
26	10.11.1956	《蕉风》第25期, 第12页	天涯	《狐狸和啄木鸟》	寓言
27	25.11.1956	《蕉风》第26期, 第6页	彭立明	《天文家》	寓言
28	25.11.1956	《蕉风》第26期, 第6页	彭立明	《守财奴》	寓言
29	10.12.1956	《蕉风》第27期, 第21-22页	萧蒙	《编辑室风波》	寓言剧
30	25.12.1956	《蕉风》第28期, 第10-12页	方天	《勇敢的孩子》	童话
31	10.01.1957	《蕉风》第29, 第22页	鲁巴	《麻雀》	寓言
32	25.01.1957	《蕉风》第30期, 第13-14页和封底内页	方天	《预感》	寓言性小说